

华东师范大学

1998

年度

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华东师大研究生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

1998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东师范大学 1998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ISBN 7-5617-2005-X

I. 华… II. 华… III. 研究生, 博士-论文-文摘-中国-1998

IV. 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072 号

华东师范大学 1998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编 著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 罗晓宁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5.75

字 数 534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1100

书 号 ISBN 7-5617-2005-X/Z·010

定 价 33.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中国哲学专业

- 中国现代哲学对形上智慧的沉思 郁振华 (1)
- 历史的辩证:走向李大钊哲学的重建 晋荣东 (6)
- 儒家中和哲学思想研究 董根洪 (11)
- 晚明自我观研究 傅小凡 (13)

世界经济专业

- 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经济学及社会实证研究 李 曜 (17)
- 论公司的控制权结构 王 彬 (20)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

- “一边倒”:缘起、发展、波折与终结——论 50 年代的中苏关系 王 鹏 (22)
- 苏联民族问题与联盟解体 张祥云 (28)
- 制度变迁中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1989 年以来的政治、
经济 and 对外关系 刘 燮 (36)
- 论科技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 徐耀新 (41)
- 日本共产党与日本政党政治 超茶英 (49)

中国近代史专业

-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1917—1937)
..... 张连国 (54)
- 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 张礼恒 (61)

世界近现代史专业

- 19 世纪法国工业化特殊性研究 沈 坚 (63)
- 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传统与变革 李建彬 (68)

教育学原理专业

- 教育中的知识传递与学生的自由 马凤岐 (73)
- 论反思性教学 熊川武 (78)

课程变革导论——兼议教师参与	蒋士会	(84)
面对实践的教育理论	周浩波	(91)
关于学校权利实现问题的研究——以某省普通高中为例	肖远军	(92)
一个县教委的若干工作——嘉鱼县教委的实地调查	张新平	(98)
论教育中的知识价值取向	陈剑华	(102)
教师专业社会化研究	周 艳	(106)
试论教师德性	陶志琼	(111)
小学班级秩序的社会学研究	李德显	(118)
西方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论辨析	夏正江	(124)

中国教育史专业

体用之辨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	曹运耕	(132)
17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中日教育发展比较	熊庆年	(138)
民国时期(1912—1949)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	黄小燕	(142)

高等教育学专业

教学工作与师范教育专业化取向	唐玉光	(147)
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与中国的实践	房剑森	(151)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安 心	(156)
高校教学质量保障模式研究	沈玉顺	(159)

普通心理学专业

射击运动员的竞赛状态焦虑及其调控	蒋碧艳	(166)
人格多侧面的分析与整合法在发展性心理咨询中的应用研究	孙新兰	(171)
意象与心理障碍	朱建军	(177)
广告认知中的边际信息加工	顾 剑	(183)
风险决策中的偏好与偏好反转研究	张 玲	(188)
内隐社会认知:攻击性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高 桦	(192)
内隐记忆实验研究方法的比较研究	高湘萍	(196)
服装外观对他人认知与自我认知影响的研究	刘 春	(200)

基础心理学专业

阅读科技文章的眼动过程研究	阎国利	(204)
---------------------	-----	-------

发展心理学专业

年幼儿童的朴素生物学研究	李 燕	(208)
心理应激条件下动物行为及组织功能变化研究	侯公林	(211)

运动生物化学专业

- 高原适应和高原训练对机体处于平原时运动能力的影响 孙小华 (215)
 长期运动训练对小鼠氧化与抗氧化能力及线粒体功能影响的研究 卢 健 (219)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 鲁迅创作心态研究 苏桂宁 (222)
 先锋小说研究 田健东 (227)

中国现代文学专业

-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李泰俊 (232)
 “忏悔贵族”的乡村遥望——鲁迅乡土小说研究 范家进 (239)
 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 杨剑龙 (243)
 孤独的诗性——沈从文小说研究 杜素娟 (246)
 兵法社会的延安文学(1937—1947) 朱鸿召 (252)
 1928—1937年国民党文学研究 倪 伟 (256)
 失宠的囚徒——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 姜云飞 (260)
 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论 庄 陶 (264)

中国文学批评专业

- 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近代化 程华平 (268)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 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 王进驹 (272)
 中国小说评点研究 谭 帆 (279)

基础数学专业

- 共形块空间的广义扭仿射李代数模的实现 王宪栋 (284)
 量子 Schubert 函子以及量子线性群的上同调 胡 峻 (288)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

- GMANOVA-MANOVA 模型的统计分析 尤进红 (292)
 衍生证券定价的非参数方法 刘 忠 (297)

无线电物理专业

- HF 地波雷达探测海况要素的研究 郑正奇 (302)
 复杂媒质非电参数的电磁波无损检测研究 宋海平 (308)

分析化学专业

- DNA 与小分子化合物相互作用的机理及应用研究 孙星炎 (311)

自然地理专业

- 长江河口悬浮体的有机特性及其动力沉积和生物地球化学行为 李道季 (315)

人文地理学专业

- 人口容量、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甘肃农村为例 张茂林 (318)
城市功能开发研究——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的范例 毛武 (321)
基于 GIS 的城市动力学研究 董益书 (324)
地理控制论的理论与实践——以淮河流域脱贫减灾, 可持续发展为例
..... 王远飞 (327)

区域地理学专业

- 中国城市行政区——社区模式研究 程玉申 (331)
中国省区经济运行的空间机制 汪宇明 (334)
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及其整合研究 周克瑜 (338)
福建农业生态系统的特性与调控 曹文志 (342)

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专业

- 上海青浦赵巷剖面全新世沉积记录的高分辨率研究 陶静 (346)
南极乔治王岛柯林斯冰帽冰川学研究 温家洪 (351)
上海 PRED 系统的演变与协同研究 袁雯 (355)

动物学专业

- 中国对虾精子发生及受精细胞学研究 康现江 (361)
河川沙塘鳢卵黄蛋白结构特征及其在积累、代谢过程中变化的研究 周忠良 (364)

生理学专业

- 单耳堵塞对鼠耳蝠中脑下丘神经元听空间反应特性发育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 周晓明 (368)
鼠耳蝠出生后中脑下丘听神经元的功能发育 冯瑞本 (371)
低频脉冲电场的细胞生理学作用机理研究 张红锋 (373)
微型传感器及活体分析新技术的研究 毛兰群 (376)

生态学专业

- 中国亚热带东部藤本植物生态学研究 蔡永立 (380)

控制与智能系统专业

城市交通动态模拟的智能方法研究与应用	王新伟 (383)
时滞线性系统与非线性系统的鲁棒 H_{∞} 控制	陆国平 (390)
分布对象技术在企业信息系统集成中的应用研究	宋海波 (399)

中国哲学专业

中国现代哲学对形上智慧的沉思

研究生 郁振华

专 业 中国哲学

导 师 冯 契 教授

杨国荣 教授

一、导论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现代哲学。采取的是专注于问题的研究进路,以问题的逻辑展开为结构原则的叙述方式。本文认为,在人物众多、流派纷呈的中国现代哲学中,存在着一个关于形上智慧之可能性的共同话语。文章试图以包括如下五个要素的概念框架来揭示这一话语的多方面的理论意蕴,它们是:(1)科学和哲学;(2)存在和天道;(3)理智和直觉;(4)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5)自由和境界。

二、科学和哲学(第一章)

(1) 1923年的科玄之争,以论战的形式尖锐地将在科学时代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问题提了出来,使之成为中国思想界、哲学界普遍的问题意识,在此意义上,本文将其确立为考察中国现代哲学关于形上智慧之可能性话语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

(2) 科玄之争是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引申出来的,以张君勱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进而肯定了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则力主科学和人生观的统一。丁文江以“存疑的唯心论”来反形而上学,理论上并不彻底。为了克服丁文江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科学万能论的信奉者在两个方向上作了努力:(一)陈独秀、邓中夏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彻底地贯彻了反形而上学的主张、甚至提出了取消哲学的口号;(二)吴稚晖、胡适则突入“不可知”的领域,试图建构一种“科学的玄

学”。

(3)《科学和人生观》一书的出版,并没有终结中国现代哲学的科学和哲学、知识和智慧之辩,相反,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进一步发展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对之作出了严肃的思考,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思路。有强调对科学加以综合、统一而从科学上升到哲学的进路(王星拱)。有强调科学和哲学之种类差别的截然二分的进路(冯友兰)。有主张从玄学中开出科学的进路(熊十力、牟宗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李达、艾思奇)提出了一种科学和哲学的积极互动的相对比较综合的进路。伴随着探索中的曲折和不同思想之间的交锋(如对叶青的“哲学消灭论”的批判),这一进路逐渐地明确起来。但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停留在对这一进路的原则性的陈述上,冯契在其早年的《智慧》一文中,以元学理论为中介,对由意见、知识向智慧的飞跃即转识成智的过程和由智慧下推而影响于意见、知识即转智成识的过程,作出了深刻的阐发,使这一进路的理论优势真正地得到了落实。

三、存在和天道(第二章)

(1)从内容上说,形上的智慧首先指向的是对存在的沉思,这就属于天道观、本体论的范畴。紧扣着中国的民族救亡和社会现代化的两大主题,中国现代哲学在天道观上主要是围绕着以共殊、理事为核心的理气之辩、以精神的能动性和自然的必然性为核心的心物之辩而展开争论的。

(2)在天道观上,清华学派的最引人注目的贡献是复兴了传统的理气之辩,并使之获得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冯友兰的理气论、金岳霖的式能论,既和传统的理气之辩有连续性,同时也非传统的理气之辩所能范围。在共殊、理事关系问题上,从冯友兰的理在事先说,到金岳霖的共相论、可能论,再到张岱年的理的“泛在论”、理在事中说,清华学派对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表现为一个逐步克服柏拉图主义倾向的过程,并在理论上渐趋合理。从总体上说,清华学派的哲学家有见于存在有条理、有秩序的一面,但在实在论的立场上,它们较多地强调了条理和秩序的自在性、本然性,而对人的存在未免有所轻忽,因此,它们对存在的考察具有一种抽象、思辨的色彩。30年代,熊伟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立场上批评冯友兰忽视“我”(即 Dasein),就有见于此。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金岳霖在其《知识论》中所提出的“化本然为自然,化自然为事实”的思路,为我们走出传统的思辨哲学指明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3)梁漱溟、熊十力、贺麟等现代新儒家在天道观上主要讨论了心物之辩,以心为本,把精神作为世界统一原理,他们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平章华梵,利用各种材料,证成了精神之维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当然,由于对心的内涵的理解不同,从梁漱溟到熊十力到贺麟,表现为一个由非理性主义转向理性主义的过程,而对精神的能动性的理解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从创造性的世界本体转向了在认识和评价关系中的主体的规范作用。虽然新儒家主要考察了心物之辩,但熊十力对理气之辩也有所涉及,他从其唯心论的本体——宇宙论的形上学出发,以体用说理气,为理气之辩转出了新境。新儒家高扬了精神之维,但是他们没有找到精神的能动性、创造性的真实基础——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同时对存在

的本然性和自在性也有所忽视,因此,他们所说的精神实际上只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原则。

(4)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主要讨论了天道观上的心物之辩,不过和新儒家相反,他们明确地主张唯物论。瞿秋白是力图从天道观的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直观唯物论的倾向。毛泽东、李达、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有较深刻的领会,但未能彻底摆脱自然本体论的倾向。既是清华学者,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张岱年,通过对实践概念的创造性发挥,对维也纳学派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理论,借此对唯物论作了有力的辩护,但其一本多极、物源心流的宇宙观仍带有自然科学唯物论的色彩。冯契在其智慧说中,将金岳霖的“化本然为自然,化自然为事实”的思想置于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提出了一套关于马克思主义天道观的设想,即其四个界(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的理论。这一天道观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是对现代哲学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的批判总结,为克服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四、理智和直觉(第三章)

(1) 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形上智慧的可能性的问题,提出了智慧如何能得的问题,由此而展开了直觉和理智之辩,具体而言,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逻辑分析、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辩证综合和理性直觉之间的关系。

(2) 清华学派从西方引进了现代形式逻辑和逻辑分析法,并深入地探讨了形式逻辑的本体论基础。但也看到了逻辑分析法在把握形上智慧方面的局限性,从而尝试了逻辑分析法和直觉法(金岳霖、冯友兰)、逻辑分析法和辩证法(张申府、张岱年)的结合问题。冯友兰还考察了直觉方法的不同形态,认为道家的直觉法采取的是知识论的进路(超越知识方面的限制),而儒家的直觉法则采取了道德的进路。

(3) 对直觉的推崇是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方法论的显著特征,在充分肯定直觉在转识成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他们展开了对直觉和理智关系的讨论。在梁漱溟那里,直觉是反理智的;在熊十力那里,直觉是超理智而不反理智的;在贺麟那里,直觉是后理智的即综合理智的成果的。从类型上说,他们的直觉说是对儒家形态的直觉的发挥,而贺麟对朱陆直觉法的分疏,对深化、具体化儒家的直觉法具有积极的意义。

(4) 马克思主义者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重视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毛泽东对辩证逻辑有创造性的运用。但是在不少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存在着忽视形式逻辑、对直觉在转识成智过程中的作用缺乏认识等理论上的不足。也有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为克服这两大缺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张氏兄弟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强调形式逻辑的重要性,主张用逻辑解析法来澄清辩证唯物论。冯契的《智慧》对道家形态的直觉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在其晚年的智慧说中,冯契在广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对逻辑分析、辩证综合和理性直觉在转识成智过程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较为合理的阐明。

五、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第四章)

(1)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形上智慧的可能性问题,就提出了智慧如何能达的问题,形上的智慧属于超名言之域的范畴,所以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不可说的东西如何能说?

(2) 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和熊伟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澄清了“可说”、“不可说”的涵义。金岳霖切入问题的方式和维特根斯坦比较接近,其对“何以有现在这个世界”的疑惑类似于维特根斯坦对世界“那样存在”的惊异的感觉,和维氏一样,他也认为这属于不可说的范畴,即非命题之所能达。熊伟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讨论语言,在把言说本体化(宇宙之说)的前提下,来讨论可说和不可说的区别和联系,既预示了后期海德格尔从语言入手切入存在的思路,也避免了在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的问题上,因割裂两者并偏于一隅所导致的肤浅的实证主义和廉价的神秘主义。

(3) 智慧之不可说和超名言不是绝对的,不能用命题来加以言说的对象可以用非命题或超命题的方式来言说,比如“思辨地说”和“诗意地说”就是其中的两种形式。冯友兰所说的“负的方法”和“进于道的诗”就内涵了这两种言说方式;金岳霖对“本然陈述”和文学的“活的语言”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探讨了这两种言说方式的内在机制;汤用彤通过对魏晋玄学和文学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诗意地说”;熊十力则通过抉发佛学的“表诠”和“遮诠”,主要考察了“思辨地说”;冯契在《智慧》中提出的即遮即表的玄言,实质上是一种颇具辩证色彩的思辨的语言。

六、自由和境界(第五章)

(1) 形上的智慧不仅有得、达的问题,更和个体的“在”(人的存在)相联系。所以,形上智慧的可能性的问题还可从人生论和境界说的角度来探讨。

(2) 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它和人性的自由发展有内在的关联,不仅具有理论的品格,而且具有实践的品格,它和人的存在合一,就构成了境界。因此,在智慧之境,天道和人道、本体和境界是一气贯通的。现代哲学家从不同的哲学立场出发,证成了这一点。张东荪从其层创进化的宇宙观出发引申出了他的主智的人生观;冯友兰通过天地境界,完成了对天道和人道的融通;熊十力通过宇宙论,将本体论和人生论融成一片;冯契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了性和天道的统一。

(3) 人和天道的合一,标志着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自由,智慧之境本质上是自由之境,其中,真、善、美这些人类的基本的精神价值一体无间,这是形上学考察自由和真善美的进路,其基本特征是重合,与之相对,价值论的探讨方式则重分,关注的是自由在不同的领域中的不同涵义,主张对真善美作分别的考察。冯友兰的天地境界标志着自由的极至,其中,真善美达到了统一;作为修养的最高成就,熊十力的实证本体的境界可以说是最自由的境界,其中真和善达到了统一;朱光潜和宗白华对美的意境作了深入的探讨,宗白华进而证成了真和美的统一;金岳霖虽然没有对自由和真善美的问题作详尽的探讨,但他却很好地表述了形上

学处理该问题的进路：“太极至真、至善、至美、至如”；在冯契的智慧说中，形上的重合思路和价值论的重分思路达到了统一。

(4) 智慧之境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理想形式，与现实人生是什么关系，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金岳霖更多地关注的是智慧之境之于现实人生的超越的一面，而冯友兰和熊十力则继承了传统哲学的主流传统，强调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冯契通过把有限和无限、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对这一传统作了新的发挥。

历史的辩证：走向李大钊哲学的重建

研究生 晋荣东

专 业 中国哲学

导 师 丁祯彦 教授

一、导论

(1)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李大钊哲学,其目的在于克服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在准确把握李大钊哲学的主旨的基础上,根据问题自身的逻辑展开对其加以重建,进而从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给予李大钊哲学合理的定位,阐明其现代意义。

(2) 历史观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论争之一。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为实践意图,李大钊从历史与历史哲学、历史的进步及其动力、历史规律和人的活动、个体与群体之辩以及新的社会理想诸方面具体展开了对于历史之域的哲学思考,其总体特征便是“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的结合”。

(3) 李大钊哲学既是中国近代哲学历史演进中的重要一环,又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并成为了近代精神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社会面临的中心问题已经从“中国向何处去”转变为“如何实现现代化”,但“古今中西”之争仍在继续并有了新的历史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定,意味着我们应该进一步发展自近代以来的哲学革命,沿着近代民族精神的主流向前推进。因此,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角度加强李大钊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哲学及其与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以及更好地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历史与历史哲学(第一章)

(1) 历史之域的哲学之思首先展开于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就此而言,“历史”一词的语义辨析构成了李大钊哲学的逻辑起点。李大钊在近代哲学史上较早地梳理出“历史”的两重内涵——“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与“一种科学的学问”,不仅使其对于历史之域的思考获得确定对象,而且从一个侧面推进了中国哲学的近代化。

(2) “历史”一词在含义上的模棱性使历史哲学同时打开了两个可能的领域。以“历史”的双重内涵为前提,对于历史的哲学之思通常被相应地划分为历史观和史学观。如果说对“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反思更多地属于历史观的范畴,那么以“一种科学的学问”的历史为考察对象则是史学观。李大钊不仅初步地意识到了历史哲学的两种类型及其从历史观向史学观的转移,而且大致勾勒并论述了两者各自讨论的主要问题。他所阐述的

历史哲学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哲学开始从自发形态向自觉形态转变的开端。

(3) 从总体上看,李大钊哲学属于历史观的范畴。他所提出的进步主义历史观,不仅从进步与秩序、进步与进化的关系,以及乐观主义与时间不可逆的预设等方面对进步观念作了具体解说,而且通过批判退落的、循环的和复古的历史观念,在承继自康有为以来的进步主义的近代传统的同时,又为民族心理进一步积淀了“进步”的意识。

三、历史进步及其动力(上):前期的历史进化论(第二章)

(1) 无论是对旧历史观的批判还是对近代化进程的推动,都要求对历史进步及其动力有一科学的认识。历史进化论以一般进化论为前提。李大钊把宇宙进化看成是一个螺旋状上升的无限前进的过程,并将宇宙进化的动力归结为对立面的统一,从而表现出朴素的实在论和自发的辩证法在自然主义形式下的结合。不过,因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他又从生存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对立面的统一,把生存意志泛化为宇宙进化的动力,于是又凸现了意志主义的倾向。

(2) 前期李大钊沿袭从宇宙进化向历史进化推绎的思路,把历史进步的动力归结为对抗与调和的统一,而他对“调和”的强调既有见于动态平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又具有否定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客观后果。与一般进化论中的意志主义倾向相一致,李大钊对历史过程作了意志主义的解释,其中不仅涉及到主体意志调节行为的一般机制,而且揭示了作为历史进步动力的意志在事实与规范两个层面上的不同内涵:“全生之志”与“善良意志”。如果说李大钊的一般进化论为历史进化论提供理论前提可以看成是历史哲学以自然哲学为前导,那么,贯穿着意志主义倾向的进化论则在某种意义上为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根据与范导。

(3) 意志主义的进步模式表明未来要靠主体的意志力量来创造,但理想社会的实现离不开对传统的批判。从内容上说,中国近代对传统的批判面临着互相联系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政治变革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结束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借助思想启蒙来冲击封建思想网罗,实现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李大钊以进化论和“民彝”论中所蕴涵的理性主义为武器,通过揭示权威主义价值观和经学独断论的内在联系,对阻碍历史进步和变革的传统作了多方面的责难,而他对意志和理性在整个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作用的双重肯定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时代特点。

四、历史进步及其动力(下):后期的唯物史观(第三章)

(1) “五四”前后,李大钊经历了从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合乎逻辑的转变,这一转变既以当时国际国内的客观社会现实为历史前提,又有蕴涵于进化论中的进步史观和理性主义为其内在理论根据。

(2) 后期李大钊一方面把历史的螺旋状进步看成是进化与革命、渐进与突变的统一,对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中的革命与改良之争作了辩证的综合;另一方面又用唯物史观修正进化论,认定历史动因不在于“心的势力”而是“物的势力”,并从“人类文化的经验说明”与“社会组织进化论”等方面对历史进步的动力机制作了具体展开,既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心物之辩

作了科学的回答,又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最初的介绍和论述。基于人类文化的经验说明,李大钊对西欧近代以来的理性史观、宗教史观、政治史观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尽管用“经济史观”指称“唯物史观”,反映出李大钊对后者的理解还不够精到,但他坚持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来解释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因,承认历史过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人类的意志、情感、社会的其他物质条件(如地理环境、人种因素等)以及上层建筑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法律、宗教、民族心理等)都对历史发生影响。相对于经济决定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胡适对“最后之因”的否定等,这一看法无疑体现着一种更为健全的思路。

(3) 唯物史观不仅在理论上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而且在实践上为俄国十月革命所证实,因而较之于进化论更具科学性和实证性的品格。李大钊化立论为方法,运用唯物史观来重释历史,既初步地探讨了道德的基础及其变迁,又科学地说明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与历程,使唯物史观在实际运用中得以展开和丰富的同时,也为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奠定了最初基础。

五、历史规律和人的活动(第四章)

(1) 对于历史进步及其动力问题的讨论,内在地关联着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相互关系。无论进化论还是唯物史观都承认人类的社会发展并非一个无根无由、缺乏自性的过程,而是有其内在联系和决定其变更递嬗的规律,但问题首先展开于如何去发现并科学地表述这样一种规律?即我们关于历史过程规律性的观念如何可能?李大钊依常识和直观起论,通过辨析时间性把时间解说为阐释关于历史过程规律性的观念的地平线,进而把这一观念理解为对历史过程之实践本质的科学表述,从而统一了历史规律之发现与历史规律之所在,较之于简单而独断地宣布是否存在历史规律或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规律,显得更为合情合理,既可爱又可信。

(2) 从怀疑甚至否定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与客观规律到对这一联系和规律持肯定的态度,无疑是历史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旦要求哲学家们对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作出具体解释时,彼此之间极为深刻的立场差异便暴露出来了。在借助对时间性的辨析以阐明我们关于历史过程规律性的观念如何可能之后,李大钊又进一步运用先验与经验、必然与偶然、一般与个别等范畴,对历史规律的辩证本性作了具体解说,既批判了奥古斯丁、胡适以及李凯尔特等关于历史规律的种种形而上学观点,也为深入批判并超越历史之域的唯一意志论和宿命论的对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3) 以历史过程的实践本质和历史规律的辩证本性为前提,李大钊对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作了多方面的考察,不仅对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有所取舍,而且与重视主体创造力量的近代精神传统相一致。随着从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原先在意志主义的形式下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都以扬弃的形式被包含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中。通过整合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李大钊为所谓的“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作了理论辩护,从而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超越了唯意志论与历史宿命论的对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上,李大钊几乎与卢卡奇同时表达了对于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准确把握。虽然用语尚欠精当,理论未

必完备,但唯物史观在李大钊那里确实充满乐观、富于生气,很少有后来那种教条气息和独断色彩。

六、个体与群体之辩(第五章)

(1) 就群己之辩而言,唯意志论往往突出历史人物即英雄的意志,而历史宿命论则更多地表现为对人民群众能动力量的忽视,因此,对唯意志论和历史宿命论的双重超越既要以对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整合为前提,又有赖于对历史领域的个体与群体之辩作深入思考。李大钊通过对卡莱尔、爱默生英雄史观的批判以及托尔斯泰历史哲学合理因素的吸收,把英雄的产生及其意志、力量归结为“众意总积”,一方面揭示了英雄的活动所赖以展开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因夸大英雄的作用而与唯意志论殊途同归。他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纯正的主位”,主张“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从而在整合历史规律与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基础上,又从个体与群体之辩的角度把近代哲学革命对历史宿命论的批判引向了深入。

(2) 历史之域的个体与群体之辩既展开于英雄与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又蕴含着主体间的交往及其形式框架等问题。以恩格斯的“合力论”为前提,李大钊认为主体间通过自由交往与讨论形成公共意志,能够使相互交错甚至彼此冲突的意志力量整合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尽管这一看法过于理想化,但从哲学史上看,他把“自由的认可”引入“公意”的形成过程,对鲍桑葵所代表的共同体主义与穆勒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作了创造性的综合,为纠正实际历史进程中的个人或党派的独裁统治创造了理论前提。而通过对“人民”作主体间关系的展开,李大钊既避免了像共同体主义者那样把人民视作铁板一块的整体(大我),又防止了像自由主义者那样把人民看成是原子式的个体(小我)的聚集,从而为超越两者之间可能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真正实现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的统一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3) 主体间交往不仅存在于生活世界,而且展开于制度世界之中;不仅有其实质性的内容,而且有应当遵循的形式框架。任何正当的、合理的主体间交往的形式框架都应该既以社会历史规律为其客观根据,又合乎人性自由全面发展的真实要求,它们作为历史进步的主要成果之一构成了历史进步的条件,推动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就形式框架所蕴含的价值原则而言,道德规范的调节作用实质上以仁道为基本原则,而法律制度的制约则更多地体现着理性的精神。从形式上看,合理的主体间交往的建构在本质上就展开为一个法制与道德并重、理性原则与仁道原则相统一的历史进步的过程。

七、新的社会理想(第六章)

(1) 历史进步以自由为目标,但科学的社会理想的提出总是展开为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进程。中国近代哲学对理想社会的探讨在总体上表现为古代“大同”理想的重新提出及其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虽然康有为、孙中山讲的大同理想都是“只以人的理性为根据”,但它们构成了李大钊社会理想的历史先导。伴随着从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李大钊开始把大同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成为了近代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人。他所构想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